

宋育仁公司思想初探

董凌锋

(解放军出版社 星火燎原编辑部,北京 100035)

摘要:公司是晚清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关注的重要目标,宋育仁就是一位对公司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维新思想家,他不仅对公司及公司制度进行理论思考,而且还亲自从事创办公司的实践活动。宋育仁的公司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他对公司的认识;其二,他对“创办什么样的公司”的构想和规划,这是其公司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宋育仁;公司;公司制度;公司思想;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3-0071-05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芸岩,号道复、问琴、问琴阁主、鸥夷逸客,私谥文康,四川富顺人。1875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一生扮演了翰林院检讨、驻英外交官、四川矿务商务监督、《渝报》及《蜀学报》创办人、尊经书院山长、湖北土药税务总局督办、学部等五部顾问、国史馆代馆长、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兼修《富顺县志》)、四川国学院院长等角色^[1]。宋育仁有“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美誉,维新变法是他在大半生追求的梦想;他著述丰富,包涵经学、小学、时论等诸多门类;他还写有大量倡导维新的著述,著名的有《时务论》、《采风记》等;在1885年撰写的《周官图谱》中他初步阐述了托古改制的主张,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考》问世早了10年。宋育仁的维新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而且他对政体、吏治、交通、税制、银行、农业、工商业等现实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宋育仁集维新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身,其维新实践包括主持商务、主讲维新、创办报刊、译介西学等活动,被称为“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晚年的宋育仁在政治方面趋于保守,但在学术文化方面却硕果累累。

维新运动时,要求经济变革是维新派倡导的改革目标之一,“标在政治,本在经济,故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2]。宋育仁生活在一个倡导经济变革的时代,他积极顺应时势,在经济方面立言立行,1905年写成的《经世财政学》是当时中国人编著的寥寥无几的经济学专著,此外,他多次上书朝廷,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铸造金币、设立银行、发展交通等。清末新政期间,他因善于办理经济事务,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办理湖北土药税务,还受直隶总督杨士骧聘请掌管北洋造币总厂。

公司思想是宋育仁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公司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都颇为重视,他不仅在其著述中多次介绍西方公司制的运行情况,大力宣扬公司制度的优点,而且还亲身从事过创办公司的实践,甲午战争后,他便以“善办工商”之名受命回四川办理商务,于重庆设立商务局,负责全川商业公司的创办事务,并亲自制定“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十五条”,对拟创建的公司作了详细规划,之后他主持兴办了许多实业公司,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煤油、煤矿、玻璃、卷烟、药材等公司,并着手创设了由重庆、上海商人合办的“川省火油公司”,极大推进了四川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对公司的认识

公司的产生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能聚集资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促

收稿日期:2015-04-18

作者简介:董凌锋(1980-),男,山西忻州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进作用^[94]。自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公司制度传入了中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公司作了介绍,“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926]。随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分别撰文论述过公司的重要作用。宋育仁对公司也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1. 对公司本身的认识

19世纪90年代初,宋育仁对公司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与公司本身密切联系的相关情况,如公司的组织形态与业务范围、公司的用人制度、维护公司利益的商会等。

在体现宋育仁早期维新思想内涵的名著《时务论》中,他在举例说明“外洋之富在于工商”的几个方面时,就提及了西方由民间集股而设立的公司,以及外国交通工具的制造全由公司承办的状况,而且注意到了外国公司众多的实际情况,并且他还认识到了西方公司的优点,即:在公司的运营机制下货物畅通,“联公司则货无所居奇,而亦不至踊滞”^[922]。此外,他还注意到了为保护公司的利益,相互联合而建立的组织——商会,并且对商会的组织情况作了介绍,“凡一市事皆立公司,数公司联为一商会,皆有首董。凡商会之程式皆定于首董,而质成于商部”^[922]。宋育仁还了解到西方公司的组织形式,即以民间集股为主,以官方入股为辅,他还对公司中对商人的任用、奖励以及升迁情况作了说明,“西例商会之公司,皆民间集股,公家如入股,付官本以听于公司,如别立官肆,则稽于商部,从其商会公司之式,主肆皆用贾人,积资劳以次升为总办,得资财以附股,而不奖以官”^[923]。

虽然宋育仁在《时务论》中对公司的认识并不深刻,主要局限于对公司本身的认识,即就事论事,并未触及到关于公司深层次以及本质性的理论,但是从他对公司及公司制度的介绍中,体现出他对这一源自西方事物的关注和思考,话语中流露出对公司的赞扬之意。

2. 对公司与银行、保险等关系之认识

到20世纪初年,宋育仁在其撰写的经济学专著《经世财政学》中,对公司予以专门论述,此时他在阐述公司的时候并非孤立地论及公司本身,而是注意到了公司与银行、保险之间的联系,“明士学则始足与言商学,首在明公司之理,次在知银行之务,尤在晓习钱币与货物出入。公司有自治之政,而无亏闭之理,有商董担任而后能集公司;有银行担任,而后能售股票;有公家保险,而后成公司;不足为良贾则不能举公司”^[94卷3P2]。宋育仁的这番论说既阐述了商董、银行、保险、良贾这些因素对于筹建公司的重要性,也阐明了公司与银行、保险之间的关系。《经世财政学》中所反映出的宋育仁20世纪初对公司的认识深度,明显要比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撰成《时务论》时对公司认识的深度更进一层,这也反映出此时宋育仁的西学素养与他在撰成《时务论》时相比较,有了较大提升。

20世纪初宋育仁对公司认识的深化以及其西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与甲午战争期间他以外交官的身份走出国门亲自目睹和考察西方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外交官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的运作情况,其中公司制度就在他的考察内容之内,通过亲身考察再加之勤于思考,他对公司的认识也随之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能促进认识的深化,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赴重庆从事创办公司的实践活动,通过丰富的创办公司的实践活动,既使他已有的对公司的认识得以指导创办公司的实践工作,同时,又在创办公司的实践中深化了他对公司的认识。

二、创办什么样的公司

宋育仁不仅介绍了公司的优点和特点,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创办公司、开创川渝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实践活动,并亲自为所创办的公司订立章程。创办公司的实践使宋育仁既有的对公司的认识得以付诸实践,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他公司思想的内涵,“创办什么样的公司”成为宋育仁维新运动期间受命赴四川创办公司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宋育仁公司思想的核心内容。

1. 誓与列强争夺利权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在华开矿、办公的热潮,中国在矿山、铁路等工商业项目方面的利

权损失严重,朝野上下几乎都一致呼吁自强御侮,而且不约而同地提出以振兴工商、发展实业为自强手段;清政府也开始重视发展工商实业,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工商实业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宋育仁以善办工商之名,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张百熙保荐出任四川商务监督,他于1897年10月抵渝开设商务局,详订招商开设公司章程。鉴于对甲午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深刻认识,宋育仁把兴办商务的宗旨明确地规定为:“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这与当时国内极力呼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潮以及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转变相一致。宋育仁提出办理商务的目的之一在于与列强争夺利权,并认为兴办商务的要领在于“开利源,塞漏卮,占市埠,保地产”,在公司的创办形式上,他提出由华商自设公司。至于宋育仁所设计的制造与转运两类公司事务,他认为虽在方法上仿效外国,但其宗旨是为避免利权外溢与外人包揽,“窃维商务因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而设,以开利源,塞漏卮,占市埠,保地产为要领,自必联华商,自设公司,始足与洋商抵。制造一切,须仿照洋法,自制自销,使利权不至于外溢;转运各货,须化散为整,自运出户,毋任外人包揽,抑勒俾土货不至贱售;至于通商码头、产矿处所,尤须预估先著,以杜外人垂涎”^{〔6〕卷6P10}。

从上述宋育仁对创办商务以及兴办公司宗旨的阐述中,体现出宋育仁对甲午后深重民族危机的切身感受,他所提出的由华商自办公司的主张以及对于制造、营运两类公司事务的规划,均建立在自强御侮的思想基础之上。维新运动期间,他在重庆主持开办了不少商业公司,甚至乐观地预料如果由他订立的公司章程早日生效,则煤油、矿、锑沙三项利权就会收归我国,而不至为外国所把持,“商业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沙。若早能奏定章程,事归划一,则煤油、矿、锑沙三项利权在我,不致纷纷争办,受制于人,其得失盖已较然可见”^{〔6〕卷6P11}。

宋育仁希望早日与列强争夺利权并获得成功的想法,反映出他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和救国思想,这与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认识相一致;但是,当时外国资本实力雄厚且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实力弱小又不受清政府重视,在这种外强我弱的背景之下,宋育仁所希望的与列强争夺利权谈何容易!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2. 拒洋股非顽固排外

宋育仁对创设何种公司的构想中除了规定公司宗旨为与列强争夺利权外,他还主张商办公司拒绝洋股的加入,竭力主张由华商自设公司、自为经营,不依赖外援,他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提出,“各公司均不准招集洋股”^{〔6〕卷4P10}。很明显,宋育仁提出这项主张是为了以此方式鼓励商办企业自立自强,进而摆脱列强对中国工商业的控制。虽然宋育仁明确提出创办公司的目的旨在与列强争夺利权,并拒绝洋股,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完全排外的态度,他理性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办理公司方面的先进性,因此,在商办公司的经营方面,宋育仁主张学习西方经营公司方面的长处,不辜负朝廷筹办商务以抵制外洋之意,流露出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川商设立公司,采运、出口均应按照外国商例,限年专办,以先设公司立案为凭,行销口岸,以承认税则为断,以上情形,倘不预为经划办理,不归一律,商本必亏无着地,利一失难收,恐非朝廷筹办商务抵制外洋之本意”^{〔6〕卷6P10}。由此可见,宋育仁能够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能够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西方公司的优点,并没有因为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而顽固地一致排外,实属难能可贵。

3. 重用商总兴办公司

宋育仁十分重视公司中任用商总,按照他对公司的构想,要充分发挥商总在公司中的作用,主张给予商总尽可能多的治理公司的权力。至于何为商总?宋育仁对其内涵予以明确界定,“每项商业以出本承办者为本项商总”^{〔6〕卷4P9},直截了当地指出出本办商业者即为商总,进而指出先由商总自筹资本筹办公司,等公司开设之后,再吸纳其他民间股份,“商本商办,先由商总自备资本开办,俟该项商业试办有准,始行推广出票,集股款以昭公信”^{〔6〕卷4P9}。此番言论体现出:在宋育仁看来,商总主要指商人,由商人自备资本来开办公司,一方面体现出宋育仁重用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与当时四川风气闭塞、发展商业的观念未能深入人心导致集股艰难的状况有密切关系,他在奏折中也如实记录了这些制约商

务开办的客观因素,“川省边僻,风气未开,集股较他省尤难,商情尤与外人不洽,此次创办商务,既未敢先集洋股,又未得借领金币,全恃多方劝导,示信商民,创为商本”^{〔6〕卷4P10}。实际上,甲午战争后,虽然清政府允许民间工商业的开办,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但资金难以筹集的问题成为制约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宋育仁重视公司中任用商总的思想还表现在具体的公司事务上,尤其是对商总的重用上。比如,他明确指出,“各项商业听由各项商总主办”,尤其在公司的用人体制上,商务总局不得干涉公司的用人制度,给予商总充分的自主人事权,不过为防止商总用人不善,规定商总对任用之人应予负责的机制,“公司用人悉由本公司商总主持,总局概不干预;所用之人或有侵欺情事,惟商总是问;总局与官场及局外有力者,俱不荐挂名乾薪,以杜情面请托”^{〔6〕卷4P10}。此外,宋育仁在他拟定的公司章程中还规定无论公司的类别属于转运公司还是制造公司,公司中所属的各项商业事务都由商总来实行高度自治,主管商务的行政官员不得过多干涉;公司章程中还规定即使对于公司其他股东所推荐之人,也由商总来指派其从事何职,不服从商总指令者责令开除,同样,公司中一旦出事,商总要义不容辞承担责任,不可推卸责任,“公司所用各友以保人保单为凭,入股万金者,准荐一人,其派任何事,仍由商总主持,不得指荐某事,办事不合,听凭开除,仍准另荐,如有亏空银钱,凭商总议赔,惟保人是问”^{〔6〕卷4P10}。

可见,宋育仁所拟定的公司章程中充分赋予了商总管理公司的人事权;另外,他还允许商总对公司章程提出建议,如有不合理之处,则及时变通,“各项商业,如开办后,情形与章程有疑者,准商总赴局呈明实在情形,量为变通酌改”^{〔6〕卷4P1}。商总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宋育仁所主张的重用商总,而商总的充当者多为商人,因此宋育仁所主张的重用商总即重用商人,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的措施无疑会充分调动起商总们主要是商人们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办公司的主人翁责任感,对于促进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育仁重用商总即主要为重用商人的思想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积极可取。

4. 部署其他具体事宜

除了上述几方面外,宋育仁还对公司的其他具体事宜进行了详尽规划,体现出他对兴办公司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由衷热爱之情。他把拟创办的商业公司分为两类,并规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商务分转运、制造两项。土货行销出口者,归入转运公司;改造土货及仿造洋货者,归入制造公司”^{〔6〕卷4P9}。另外,他还在公司章程中阐述了商务局的职责,声明商务局应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充当沟通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占销口岸、购运机器、延请匠师、订立合同等事,仍须由各衙门及商务总局护持,以免阻疑;如有意外、流弊、必须变通之处,由总局约集各商总酌议。所议如出自下情,总局代达官府;如出自官论,亦由总局转论商家”^{〔6〕卷4P9}。而且,宋育仁还对商办公司的运营提出要“预筹销路”的规划,要求在各重要通商口岸设立转运、制造分公司,由总局来处理分公司与地方机构的交涉,“商业须预筹销路。拟由商务局派设宜昌、汉口、上海等处转运、制造分公司,其与各地方衙门及海关交涉事件,由总局咨请本省各衙门,分别咨详各省督抚关道立案”^{〔6〕卷4P9}。这体现了宋育仁想充分利用商务局的职能来促进商业公司发展的思想。除此之外,他对各分公司的具体职责以及人事任命、经费来源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而且还提出了发行股票的具体做法,如股票票面的内容、领股息的办法,还对公司的财务问题,诸如货本、人工、运价、开销、利润等也作了规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保护公司发明专利的主张,同时建议公司在享受专利一年之后要推广专利,对将发明的专利据为己有而不将其推广的公司,总局予以督察,“援照商例,酌予专利年限,别家不得仿造;如苟图专利,无意推广者,应由总局随时督察,以昭公允”^{〔6〕卷4P10}。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育仁对创办公司作了周密细致的规划,体现出他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高度重视,用

心可谓良苦,他的公司思想在今天也具有启示意义。宋育仁不仅积极介绍西方公司及公司制度的具体情况,宣扬公司的运作方式和优点,而且还把创办公司与近代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将对公司的认识及时运用到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实践中。宋育仁在吸取洋务派所办的官办以及官督商办企业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亲自订立《四川商务公司章程》,鼓励华商积极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主张筹建股份制公司,在他的主持下,四川第一批近代民族工商企业得以创建,四川的民族经济得以萌生和发展,宋育仁无愧于“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的称号。

对于公司这种发展工商业的组织形式,维新派人士中对其重视者不乏其人。以陈炽为例,他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对公司的作用比较重视,对西方强国依靠公司之力量富强深有感触,指出“公司一事,乃富国强兵之实际,亦长驾远驭之宏规”^{[7]97-98}。后在《续富国策》中又对公司的优点予以专门论述,还呼吁设立商律来维护公司的发展,并且还提到了企业文化建设问题。宋育仁的公司思想与陈炽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二人均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予以高度重视与肯定,都对公司如何有效运行作了构想和规划;不同之处在于:二人对于公司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宋育仁结合其创办公司的亲身实践,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论述其公司思想,涉及创办公司的宗旨、公司的人事任命、公司的类别、公司的具体事务、公司经费等诸多方面;而陈炽没有创办公司的亲身实践活动,因此其公司思想主要侧重于对公司制度的宏观思考,如公司的优点、作用、公司信誉问题等。此外,宋育仁有着主持商务、创办公司的亲身经历,其公司思想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而陈炽却只是从理论上对公司予以阐述,有点“纸上谈兵”的务虚成分。因此,宋育仁的公司思想是其对公司的理论认识与从事创办公司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比陈炽以及未从事过创办公司实践的其他维新派人士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 [1]宋维彝.宋芸子先生行状[O].北京:石老娘胡同傅沅林先生捐,1931.
- [2]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9.
- [3]李 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张登德.寻求近代富强之道的先驱——陈炽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5.
- [5]宋育仁.时务论[M].上海:上海官书局,1903.
- [6]宋育仁.经世财政学[M].上海:上海同文书社,1905.
- [7]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Preliminary Studies on Song Yuren's Company Thoughts

Dong Lingf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rairie Fir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The company is the important goal that some knowledgeable people focused 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ng Yuren also is a reform thinker wh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and thought deeply to the company system. Not only he thought theoretically on the company, but also he engaged in personally the practice of setting up company. His thought about company include mainly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understanding on companies and company system; secondly, thinking and planning how to set up the company, which is the core of its ideas.

Key words: Song Yuren; company; the company system; the company thought; reform movement

(责任编辑 张春生)